



困境的突破

2006年1月1日

来源:本站首发

作者:丘山石

作者其他文章

暂无

栏目广告6, 生成文

件 HTDOCS/NEWXX9. HTM 备用,

困境的突破

丘山石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而最终是以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为法宝,突破了所有困境,并开创出新的繁荣局面。在当今面临西方强势文化逼压的形势下,仍只有秉持这一元精神,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心性学相通,才能逐步改变当今所面临的尴尬的局面,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关键词: 生存 意义 困境 突破

“困境就是‘困’在‘境’里,不能敞开”^[1]。困境的突破,就意味着所“困”之“境”被“敞开”。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当春秋战国之时,宗周式微,诸侯纷起,不仅祸连年,生灵涂炭,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人们陷入生存与意义双重危机之中。而当南宋之时,一方面异族入侵、华夏陵夷;另一方面自五代以来佛老之学横溢天下,汉民族由此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意义危机。近现代以来,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异体文化随之大举涌入,中国人赖以询问意义的传统儒学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37年日军的全面侵华,对中国人进行残酷杀戮,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亡绝灭境地。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所赖以询问意义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洋务运动之时,虽然国门早已被叩开,但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的即是能更好地维护传统政治形态和思想形态。如梁启超所言,人们在此之前“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造之未习,格致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2-p2]。1894年的中日战争,伴随着北洋水师摧折、灰飞烟灭之后,中国人传统思想大厦根基也开始产生动摇。国人开始由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转向“别求新声于异邦”,向泰西各国求取新的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以强国保种。随后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包括新中国的建立，都是这一思想历程的继续。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走出国门，求取强国之路的历史。对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连串历史进程中，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至少从戊戌变法开始，国家变革的思想资源转移到了哲学（或西方文化），形成了向哲学询问，哲学应答，并发用为变革行为，形成新的问—答—行结构”^[1]。“之后的历次变革，思想资源几乎完全从哲学中来”^[1]。从表面上看，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确是如此，但只要稍作细致分析，便会立即感悟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革史，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得以大放光彩的历史。在近现代一系列生存与意义危机中，最终藉以摆脱困境的，是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正是因为这一元精神，中国人才一次又一次突破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又《系辞下》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3-p69]所谓乾，即健，就是天体永不停息地运转，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它，改变它。乾象天，崇高广大；象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乾，元亨利贞”^[3-p1]。朱熹谓：“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3-p1]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乾位其首，表示中国人重乾、崇阳的进取精神。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3-p2]君子法其至刚之德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之一。数千年来，正是这一重乾崇阳、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而创造了如此灿烂的华夏文明。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3-p58]又曰：“生生之谓易。”（同上）^[3-p58]朱熹谓：“日新者，久而无穷。”^[3-p58]刘沅曰：“日新，无时不然，而无一息之间断。”^[4-p641]一句话，日新就是不断更新、不断进取的意思。日新又新，其德业不可能不盛大。所谓“生生”，《周易·正义》曰：“生生，不绝之辞。”^[5-p611]朱熹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3-p58]综而言之，所谓“生生”，即生，使之生。阴阳变易，生生无穷，无有止息。一部《易经》所表述的，就是生生不息的道理。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p65]，而“变通者，趣时者也”^[3-p64]。“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5-p2]。易六十四卦所描述的就是阴阳变化的过程。孔子生当诸侯陵夷、生灵涂炭之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变革损益三世之道，为万世垂范。朱熹生当国家危亡、儒门淡泊、人心陷溺之际，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终成重构儒学思想大厦之功。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终日乾乾，革故鼎新，终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

二

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元精神终使人们突破无数次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那么，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6]，是否也能藉之予以避免或摆脱呢？对于西方哲学历史，黄玉顺曾这样表述：“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6]如其所言，整个西方哲学史，即是一部“言说”史。“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6]。“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6]。虽说这一所谓“语言的牢笼”是西方哲学所面临的，但在西风东渐日益强盛，且中国学术领域亦已基本为西方语境所笼罩的今天，这一“语言的牢笼”也势将降临。为此，如何避免或摆脱这一“语言的牢笼”，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实，在当今中国学人面前，已经面临着所谓双重的“语言的牢笼”：一是如前所言的西方哲学自身的“语言的牢笼”；一是近现代西风东渐，造成中国学术空间为西方话语所笼罩的“语言的牢笼”。这两个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即是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建中国人意义解释系统必须突破的意义困境。对于前者而言，是较深层次的，因而它目前还只是一部分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所面临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面临的则是后者。西方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6]，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典之一的《中庸》则云：“率性之谓道。”^[7-p1]长期与儒学并立的佛教禅宗索性拒斥语言的言说，宣称自己“不立文字”。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形上思维的始终是一种直觉体验的“体道”方式。这是因为，在语言方面，汉民族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形象语言。比如西方哲学对于“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表述，而汉民族的“是”在其产生之初就隐含有本体（本在、本真）之义。《说文解字》云：“是，直也，从日正。”^[8-p39]“日正”即以“日”为准则，“是”即含有准则、断定之义，如“实事求是”之“是”。由于汉民族语言本身具有的特点所致，中国人对形上思维的表述向来都是十分地简略，有时干脆宣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所阐述的，无不是一种心灵体验哲学。表现在他们各自典籍上的问一答一行的“流”，即所谓的“道”或“法”或“理”，严格地说，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系统，而是一种为生民安身立命的意义解释系统。虽然儒家学说的另一圣典《易经》曾说：“一阴一阳之谓道。”^[3-p58]中国学人受此启发也曾歧异出“认识心”，但兴许是历史机缘或思想内在在局限所致，并没能阐发出类似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所有思想的证悟与契合最终都以心灵体验为依归。儒家如此，佛道二家亦如此。虽然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在推动近代实证科学发展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却未能如中国儒家的心灵体验哲学那样挣脱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因而在此意义上，只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便能在规避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时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有效地摆脱所面临的一系列“语言的牢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方文化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这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

三

近现代以来，为突破生存的困境，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为回应西方强势文化的逼压，学人们通过“变通”，以创造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中国哲学。中国在清代以前并没有“哲学”一词，只在《诗经》等典籍中有“哲王”、“哲匠”、“哲夫”“哲妇”等词语。“哲”古作“喆”或“嘉”，意为聪明，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表述的“爱知”之意不同。中国人使用“哲学”一词，源自清末留日学生从东洋舶来。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由于中日文化历史渊源异常地密切，因而便立即被中国学者普遍使用，尽管此前也有不少学者从西方哲学著作直接翻译了各种译名。“哲学”一词被舶来后，为适应社会变革需要，中国学人们便尝试从西方哲学概念中，找出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原有的思想，用西方哲学架构来建构中国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永远不存在什么困境，但中国学人为适应当时新的社会形态而建构的所谓的中国哲学，由于它的建构十分地仓促，而且是模仿西方哲学架构而建立的，它的民间基础十分地薄弱，所以并未能圆满解释民间形下层面的生活，而民间也不向它询问意义。同时，因为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尚处于学术转换阶段，所以也未能解释国人形上层面的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也不向其询问。这样，中国哲学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造成学自学而行自行，问一答一行的“流行”格式始终无法有效建立。面对这一困境，中国学人该如何去突破呢？是宣告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已经失去意义，从而要么以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为依归，要么将之摈弃转而全面无条件接受西方哲学的教育，并完全以之为中国人的意义解释系统，还是继续这一努力，最终完成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在西风东渐已经百多年的今天，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早已失去了它的学术基础，而全面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式的解释系统在现如今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西方哲学始终无法突破其自身“语言的牢笼”的情况下，不加分辨地“自投罗网”，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为此，秉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精神，通过“趣时”、“变通”，以“援西入中”的方式，完成中国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则是新一代中国学人不可推却的责任。近现代百多年的中国与孔子所处的东周及朱熹所处的南宋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都同样面临着生存与意义双重困境。不同的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采用的话语系统仍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孔子所生活的鲁国，当时在文化上是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而他所采用的是以“用夏变夷”的方式。南宋的朱熹亦是如此，他在援佛入儒之时，处于主体地位的仍是儒学话语。在近现代百多年

来，由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虽然学人们“我海他川”及“我川他海”^[9]两种方式并用，但更多的是以“我川他海”，即所谓“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造成传统的儒学话语淹没在西方哲学话语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完全被肢解。在西方哲学话语中，“道是逻各斯”，“孔子是苏格拉底”，“朱熹是康德”，“朱熹的理与气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等等，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思想文化不幸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为此，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如果继续采用那种“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来构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被彻底肢解，并且又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

那么，应如何冲破这一牢笼，摆脱这一困境呢？其实，中国传统儒学先贤先圣们早已为我们指明一条永远充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生生”。生，使之生，任何事物都必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才能永久地发展下去，哲学思辨亦是如此。中国儒学创始者们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坚白不二”之类的玄辨采取规避的态度，始终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社会。宋儒在援佛入儒之时，亦是将释氏许多空虚的所谓高妙之论尽皆黜落。如朱熹在以释氏的“月印万川”来解释理学的“理一分殊”时，仍是批判释氏一些空虚的玄辨。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援西入中”之时，也必须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儒家心性学相通（为避免被庸俗化或被简单地政治意识形态化，因而仍须保持其本然的超越维度），以逐步改变当今“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尴尬局面，最终真正完成中国新的意义系统的构建。

总 论

综上所述，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宝典《易经》所折射的元精神“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不仅是突破生存困境大法宝，也是突破意义困境，走出迷宫的唯一生路。弘扬中国儒家所阐发的心灵哲学，将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尽皆黜落而皈依于心灵，因为心灵乃是语言的家园。从来大道至简，不可溺于玄辨。只有通过心灵的超绝，才能与世界沟通，无物我、无内外、无主客、无天人，最终实现廓然大公，涵容所有的哲学视域，把目光投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参考文献:

- [1] 邓曦泽.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 [2] 梁启超. 西政丛书. 序[M]. 慎记书庄, 1897年石印本.
- [3] 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第五种: 朱熹. 周易本义[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 [4] 马振彪, 张善文. 周易学说[Z].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
- [5]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 [6] 黄玉顺. 语言的牢笼— 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 [7] 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第二种: 朱熹. 中庸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 [8]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9] 邓曦泽. 论“我海他川”的言说方式[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丘山石：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困境的突破

丘山石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而最终是以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为法宝，突破了所有困境，并开创出新的繁荣局面。在当今面临西方强势文化逼压的形势下，仍只有秉持这一元精神，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心性学相通，才能逐步改变当今所面临的尴尬的局面，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关键词：生存 意义 困境 突破

“困境就是‘困’在‘境’里，不能敞开”^[1]。困境的突破，就意味着所“困”之“境”被“敞开”。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当春秋战国之时，宗周式微，诸侯纷起，不仅战祸连年，生灵涂炭，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人们陷入生存与意义双重危机之中。而当南宋之时，一方面异族入侵、华夏陵夷；另一方面自五代以来佛老之学横溢天下，汉民族由此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意义危机。近现代以来，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异体文化随之大举涌入，中国人赖以询问意义的传统儒学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37年日军的全面侵华，对中国人进行残酷杀戮，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亡绝灭境地。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所赖以询问意义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洋务运动之时，虽然国门早已被叩开，但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的即是能更好地维护传统政治形态和思想形态。如梁启超所言，人们在此之前“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造之未习，格致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2-p2]。1894年的中日战争，伴随着北洋水师樯摧橹折、灰飞烟灭之后，中国人传统思想大厦根基也开始产生动摇。国人开始由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转向“别求新声于异邦”，向泰西各国求取新的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以强国保种。随后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包括新中国的建立，都是这一思想历程的继续。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走出国门，求取强国之路的历史。对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连串历史进程中，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至少从戊戌变法开始，国家变革的思想资源转移到了哲学（或西方文化），形成了向哲学询问，哲学应答，并发用为变革行为，形成新的问—答—行结构”^[1]。“之后的历次变革，思想资源几乎完全从哲学中来”^[1]。从表面上看，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确是如此，但只要稍作细致分析，便会立即感悟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革史，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得以大放光彩的历史。在近现代一系列生存与意义危机中，最终藉以摆脱困境的，是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正是因为这一元精

神，中国人才一次又一次突破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又《系辞下》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3-p69]所谓乾，即健，就是天体永不停息地运转，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它，改变它。乾象天，崇高广大；象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乾，元亨利贞”^[3-p1]。朱熹谓：“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3-p1]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乾位其首，表示中国人重乾、崇阳的进取精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3-p2]君子法其至刚之德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之一。数千年来，正是这一重乾崇阳、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而创造了如此灿烂的华夏文明。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3-p58]又曰：“生生之谓易。”（同上）^[3-p58]朱熹谓：“日新者，久而无穷。”^[3-p58]刘沅曰：“日新，无时不然，而无一息之间断。”^[4-p641]一句话，日新就是不断更新、不断进取的意思。日新又新，其德业不可能不盛大。所谓“生生”，《周易·正义》曰：“生生，不绝之辞。”^[5-p611]朱熹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3-p58]综而言之，所谓“生生”，即生，使之生。阴阳变易，生生无穷，无有止息。一部《易经》所表述的，就是生生不息的道理。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p65]，而“变通者，趣时者也”^[3-p64]。“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5-p2]。易六十四卦所描述的就是阴阳变化的过程。孔子生当诸侯陵夷、生灵涂炭之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变革损益三世之道，为万世垂范。朱熹生当国家危亡、儒门淡泊、人心陷溺之际，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终成重构儒学思想大厦之功。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终日乾乾，革故鼎新，终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

二

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元精神终使人们突破无数次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那么，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6]，是否也能藉之予以避免或摆脱呢？对于西方哲学历史，黄玉顺曾这样表述：“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6]如其所言，整个西方哲学史，即是一部“言说”史。“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6]。“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6]。虽说这一所谓“语言的牢笼”是西方哲学所面临的，但在西风东渐日益强盛，且中国学术领域亦已基本为西方语境所笼罩的今天，这一“语言的牢笼”也势将降临。为此，如何避免或摆脱这一“语言的牢笼”，已经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实，在当今中国学人面前，已经面临着所谓双重的“语言的牢笼”：一是如前所言的西方哲学自身的“语言的牢笼”；一是近现代西风东渐，造成中国学术空间为西方话语所笼罩的“语言的牢笼”。这两个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即是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建中国人意义解释系统必须突破的意义困境。对于前者而言，是较深层次的，因而它目前还只是一部分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所面临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面临的则是后者。西方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6]，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典之一的《中庸》则云：“率性之谓道。”^[7—p1]长期与儒学并立的佛教禅宗索性拒斥语言的言说，宣称自己“不立文字”。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形上思维的始终是一种直觉体验的“体道”方式。这是因为，在语言方面，汉民族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形象语言。比如西方哲学对于“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表述，而汉民族的“是”在其产生之初就隐含有本体（本在、本真）之义。《说文解字》云：“是，直也，从日正。”^[8—p39]“日正”即以“日”为准则，“是”即含有准则、断定之义，如“实事求是”之“是”。由于汉民族语言本身具有的特点所致，中国人对形上思维的表述向来都是十分地简略，有时干脆宣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所阐述的，无不是一种心灵体验哲学。表现在他们各自典籍上的问—答—行的“流”，即所谓的“道”或“法”或“理”，严格地说，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系统，而是一种为生民安身立命的意义解释系统。虽然儒家学说的另一圣典《易经》曾说：“一阴一阳之谓道。”^[3—p58]中国学人受此启发也曾歧异出“认识心”，但兴许是历史机缘或思想内在局限所致，并没能阐发出类似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所有思想的证悟与契合最终都以心灵体验为依归。儒家如此，佛道二家亦如此。虽然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在推动近代实证科学发展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却未能如中国儒家的心灵体验哲学那样挣脱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因而在此意义上，只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便能在规避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时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有效地摆脱所面临的一系列“语言的牢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方文化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这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

三

近现代以来，为突破生存的困境，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为回应西方强势文化的逼压，学人们通过“变通”，以创造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中国哲学。中国在清代以前并没有“哲学”一词，只在《诗经》等典籍中有“哲王”、“哲匠”、“哲夫”“哲妇”等词语。“哲”古作“喆”或“嘉”，意为聪明，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表述的“爱知”之意不同。中国人使用“哲学”一词，源自清末留日学生从东洋舶来。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由于中日文化历史渊源异常地密切，因而便立即被中国学者普遍使用，尽管此前也有不少学者从西方哲学著作直接翻译了各种译名。“哲学”一词被舶来后，为适应社会变革需要，中国学人们便尝试从西方哲学概念中，找出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原有的思想，用西方哲学架构来建构中国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永远不存在什么困境，但中国学人为适应当时新的社会形态而建构的所谓的中国哲学，由于它的建构十分地仓促，而且是模仿西方哲学架构而建立的，它的民间基础十分地薄弱，所以并未能圆满解释民间形下层面的生活，而民间也不向它询问意义。同时，因为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尚处于学术转换阶段，所以也未能解释国人形上层面的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也不向其询问。这样，中国哲学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造成学自学而行自行，问—答—行的“流行”格式始终无法有效建立。面

对这一困境，中国学人该如何去突破呢？是宣告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已经失去意义，从而要么以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为依归，要么将之摈弃转而全面无条件接受西方哲学的教育，并完全以之为中国人的意义解释系统，还是继续这一努力，最终完成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在西风东渐已经百多年的今天，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早已失去了它的学术基础，而全面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式的意义解释系统在现如今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西方哲学始终无法突破其自身“语言的牢笼”的情况下，不加分辨地“自投罗网”，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为此，秉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精神，通过“趣时”、“变通”，以“援西入中”的方式，完成中国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则是新一代中国学人不可推却的责任。近现代百多年的中国与孔子所处的东周及朱熹所处的南宋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都同样面临着生存与意义双重困境。不同的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采用的话语系统仍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孔子所生活的鲁国，当时在文化上是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而他所采用的是以“用夏变夷”的方式。南宋的朱熹亦是如此，他在援佛入儒之时，处于主体地位的仍是儒学话语。在近现代百多年来，由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虽然学人们“我海他川”及“我川他海”^[9]二种方式并用，但更多的是以“我川他海”，即所谓“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造成传统的儒学话语淹没在西方哲学话语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完全被肢解。在西方哲学话语中，“道是逻各斯”，“孔子是苏格拉底”，“朱熹是康德”，“朱熹的理与气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等等，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思想文化不幸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为此，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如果继续采用那种“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来构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被彻底肢解，并且又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

那么，应如何冲破这一牢笼，摆脱这一困境呢？其实，中国传统儒学先贤先圣们早已为我们指明一条永远充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生生”。生，使之生，任何事物都必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才能永久地发展下去，哲学思辨亦是如此。中国儒学创始者们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坚白不二”之类的玄辨采取规避的态度，始终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社会。宋儒在援佛入儒之时，亦是将释氏许多空虚的所谓高妙之论尽皆黜落。如朱熹在以释氏的“月印万川”来解释理学的“理一分殊”时，仍是批判释氏一些空虚的玄辨。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援西入中”之时，也必须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儒家心性学相通（为避免被庸俗化或被简单地政治意识形态化，因而仍须保持其本然的超越维度），以逐步改变当今“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尴尬局面，最终真正完成中国新的意义系统的构建。

总 论

综上所述，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宝典《易经》所折射的元精神“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不仅是突破生存困境大法宝，也是突破意义困境，走出迷宫的唯一生路。弘扬中国儒家所阐发的心灵哲学，将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尽皆黜落而皈依于心灵，因为心灵乃是语言的家园。从来大道至简，不可溺于玄辨。只有通过心灵的超绝，才能与世界沟通，无物我、无内外、无主客、无天人，最终实现廓然大公，涵容所有的哲学视域，把目光投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1] 邓曦泽.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 [2] 梁启超. 西政丛书. 序[M]. 慎记书庄, 1897年石印本.
- [3] 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第五种: 朱熹. 周易本义[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 [4] 马振彪, 张善文. 周易学说[Z].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
- [5]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 [6] 黄玉顺. 语言的牢笼— 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 [7] 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第二种: 朱熹. 中庸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 [8]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9] 邓曦泽. 论“我海他川”的言说方式[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丘山石: 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困境的突破

丘山石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 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 而最终是以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为法宝, 突破了所有困境, 并开创出新的繁荣局面。在当今面临西方强势文化逼压的形势下, 仍只有秉持这一元精神, 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 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 以与心性学相通, 才能逐步改变当今所面临的尴尬的局面, 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关键词: 生存 意义 困境 突破

“困境就是‘困’在‘境’里, 不能敞开”^[1]。困境的突破, 就意味着所“困”之“境”被“敞开”。在中国历史上, 曾多次出现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当春秋战国之时, 宗周式微, 诸侯纷起, 不仅战祸连年, 生灵涂炭, 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人们陷入生存与意义双重危机之中。而当南宋之时, 一方面异族入侵、华夏陵夷; 另一方面自五代以来佛老之学横溢天下, 汉民族由此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意义危机。近现代以来, 自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

门，西方异体文化随之大举涌入，中国人赖以询问意义的传统儒学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37年日军的全面侵华，对中国人进行残酷杀戮，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亡绝灭境地。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所赖以询问意义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洋务运动之时，虽然国门早已被叩开，但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的即是能更好地维护传统政治形态和思想形态。如梁启超所言，人们在此之前“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造之未习，格致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 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2-p2]。1894年的中日战争，伴随着北洋水师檣摧櫓折、灰飞烟灭之后，中国人传统思想大厦根基也开始产生动摇。国人开始由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转向“别求新声于异邦”，向泰西各国求取新的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以强国保种。随后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包括新中国的建立，都是这一思想历程的继续。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走出国门，求取强国之路的历史。对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连串历史进程中，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至少从戊戌变法开始，国家变革的思想资源转移到了哲学（或西方文化），形成了向哲学询问，哲学应答，并发用为变革行为，形成新的问—答—行结构”^[1]。“之后的历次变革，思想资源几乎完全从哲学中来”^[1]。从表面上看，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确是如此，但只要稍作细致分析，便会立即感悟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变革史，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得以大放光彩的历史。在近现代一系列生存与意义危机中，最终藉以摆脱困境的，是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的生产斗争中积累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易经》所折射出的“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元精神。正是因为这一元精神，中国人才一次又一次突破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又《系辞下》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3-p69]所谓乾，即健，就是天体永不停息地运转，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它，改变它。乾象天，崇高广大；象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乾，元亨利贞”^[3-p1]。朱熹谓：“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3-p1]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乾位其首，表示中国人重乾、崇阳的进取精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3-p2]君子法其至刚之德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精神之一。数千年来，正是这一重乾崇阳、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而创造了如此灿烂的华夏文明。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3-p58]又曰：“生生之谓易。”（同上）^[3-p58]朱熹谓：“日新者，久而无穷。”^[3-p58]刘沅曰：“日新，无时不然，而无一息之间断。”^[4-p641]一句话，日新就是不断更新、不断进取的意思。日新又新，其德业不可能不盛大。所谓“生生”，《周易·正义》曰：“生生，不绝之辞。”^[5-p611]朱熹谓：“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3-p58]综而言之，所谓“生生”，即生，使之生。阴阳变易，生生无穷，无有止息。一部《易经》所表述的，就是生生不息的道理。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p65]，而“变通者，趣时者也”^[3-p64]。“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5-p2]。易六十四卦所描述的就是阴阳变化的过程。孔子生当诸侯陵夷、生灵涂炭之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变革损益三世之道，为万世垂范。朱熹生当国家危亡、儒门淡泊、人心陷溺之际，出入佛老、援佛入儒，终成重构儒学思想大厦之功。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终日乾乾，革故鼎新，终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

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元精神终使人们突破无数次生存困境与意义困境。那么，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6]，是否也能藉之予以避免或摆脱呢？对于西方哲学历史，黄玉顺曾这样表述：“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6]如其所言，整个西方哲学史，即是一部“言说”史。“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6]。“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6]。虽说这一所谓“语言的牢笼”是西方哲学所面临的，但在西风东渐日益强盛，且中国学术领域亦已基本为西方语境所笼罩的今天，这一“语言的牢笼”也势将降临。为此，如何避免或摆脱这一“语言的牢笼”，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实，在当今中国学人面前，已经面临着所谓双重的“语言的牢笼”：一是如前所言的西方哲学自身的“语言的牢笼”；一是近现代西风东渐，造成中国学术空间为西方话语所笼罩的“语言的牢笼”。这两个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即是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建中国人意义解释系统必须突破的意义困境。对于前者而言，是较深层次的，因而它目前还只是一部分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所面临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面临的则是后者。西方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6]，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典之一的《中庸》则云：“率性之谓道。”^[7—p1]长期与儒学并立的佛教禅宗索性拒斥语言的言说，宣称自己“不立文字”。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形上思维的始终是一种直觉体验的“体道”方式。这是因为，在语言方面，汉民族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形象语言。比如西方哲学对于“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表述，而汉民族的“是”在其产生之初就隐含有本体（本在、本真）之义。《说文解字》云：“是，直也，从日正。”^[8—p39]“日正”即以“日”为准则，“是”即含有准则、断定之义，如“实事求是”之“是”。由于汉民族语言本身具有的特点所致，中国人对形上思维的表述向来都是十分地简略，有时干脆宣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所阐述的，无不是一种心灵体验哲学。表现在他们各自典籍上的问—答—行的“流”，即所谓的“道”或“法”或“理”，严格地说，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系统，而是一种为生民安身立命的意义解释系统。虽然儒家学说的另一圣典《易经》曾说：“一阴一阳之谓道。”^[3—p58]中国学人受此启发也曾歧异出“认识心”，但兴许是历史机缘或思想内在局限所致，并没能阐发出类似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所有思想的证悟与契合最终都以心灵体验为依归。儒家如此，佛道二家亦如此。虽然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知理性在推动近代实证科学发展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却未能如中国儒家的心灵体验哲学那样挣脱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因而在此意义上，只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便能在规避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时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有效地摆脱所面临的一系列“语言的牢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方文化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这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

近现代以来，为突破生存的困境，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为回应西方强势文化的逼压，学人们通过“变通”，以创造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中国哲学。中国在清代以前并没有“哲学”一词，只在《诗经》等典籍中有“哲王”、“哲匠”、“哲夫”“哲妇”等词语。“哲”古作“喆”或“嘉”，意为聪明，与古希腊哲学家所表述的“爱知”之意不同。中国人使用“哲学”一词，源自清末留日学生从东洋舶来。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由于中日文化历史渊源异常地密切，因而便立即被中国学者普遍使用，尽管此前也有不少学者从西方哲学著作直接翻译了各种译名。“哲学”一词被舶来后，为适应社会变革需要，中国学人们便尝试从西方哲学概念中，找出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原有的思想，用西方哲学架构来建构中国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对于哲学本身而言，它永远不存在什么困境，但中国学人为适应当时新的社会形态而建构的所谓的中国哲学，由于它的建构十分地仓促，而且是模仿西方哲学架构而建立的，它的民间基础十分地薄弱，所以并未能圆满解释民间形下层面的生活，而民间也不向它询问意义。同时，因为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尚处于学术转换阶段，所以也未能解释国人形上层面的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也不向其询问。这样，中国哲学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造成学自学而行自行，问—答—行的“流行”格式始终无法有效建立。面对这一困境，中国学人该如何去突破呢？是宣告这一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已经失去意义，从而要么以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为依归，要么将之摈弃转而全面无条件接受西方哲学的教育，并完全以之为中国人的意义解释系统，还是继续这一努力，最终完成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在西风东渐已经百多年的今天，复兴原汁原味的传统儒学早已失去了它的学术基础，而全面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式的意义解释系统在现如今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西方哲学始终无法突破其自身“语言的牢笼”的情况下，不加分辨地“自投罗网”，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为此，秉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元精神，通过“趣时”、“变通”，以“援西入中”的方式，完成中国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的建构，则是新一代中国学人不可推却的责任。近现代百多年的中国与孔子所处的东周及朱熹所处的南宋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都同样面临着生存与意义双重困境。不同的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采用的话语系统仍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孔子所生活的鲁国，当时在文化上是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而他所采用的是以“用夏变夷”的方式。南宋的朱熹亦是如此，他在援佛入儒之时，处于主体地位的仍是儒学话语。在近现代百多年来，由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虽然学人们“我海他川”及“我川他海”^[9]二种方式并用，但更多的是以“我川他海”，即所谓“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造成传统的儒学话语淹没在西方哲学话语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完全被肢解。在西方哲学话语中，“道是逻各斯”，“孔子是苏格拉底”，“朱熹是康德”，“朱熹的理与气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等等，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的传统思想文化不幸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为此，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如果继续采用那种“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言说方式来构建新的意义解释系统，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被彻底肢解，并且又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哲学的“语言的牢笼”。

那么，应如何冲破这一牢笼，摆脱这一困境呢？其实，中国传统儒学先贤先圣们早已为我们指明一条永远充满光明的大道，那就是“生生”。生，使之生，任何事物都必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才能永久地发展下去，哲学思辨亦是如此。中国儒学创始者们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坚白不二”之类的玄辨采取规避的态度，始终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社会。宋儒在援佛入儒之时，亦是释氏许多空虚的所谓高妙之论尽皆黜落。如朱熹在以释氏的“月印万川”来解释理学的“理一分殊”时，仍是批判释氏一些空虚的玄辨。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援西入中”之时，也必须把西方哲学话语里玄虚的部分尽皆黜落，将其学术信仰内纯思辨的形上慰藉导引至心灵的体验之中，以与儒家心性学相通（为避免被庸俗化或被简单地政治意识形态化，因而仍须保持其本然的超越维度），以逐步改变当今“我川他海”，即“汉话胡说”的尴尬局面，最终真正完成中国新的意义系统的构建。

总 论

综上所述，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宝典《易经》所折射的元精神“乾健”、“自强不息”、“日新”、“生生”、“变通”等，不仅是突破生存困境大法宝，也是突破意义困境，走出迷宫的唯一生路。弘扬中国儒家所阐发的心灵哲学，将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牢笼”尽皆黜落而皈依于心灵，因为心灵乃是语言的家园。从来大道至简，不可溺于玄辨。只有通过心灵的超绝，才能与世界沟通，无物我、无内外、无主客、无天人，最终实现廓然大公，涵容所有的哲学视域，把目光投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参考文献:

- [1] 邓曦泽.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 [2] 梁启超. 西政丛书. 序[M]. 慎记书庄, 1897年石印本.
- [3] 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第五种: 朱熹. 周易本义[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 [4] 马振彪, 张善文. 周易学说[Z].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
- [5]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 [6] 黄玉顺. 语言的牢笼— 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 [7] 宋元人注. 四书五经第二种: 朱熹. 中庸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 [8]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9] 邓曦泽. 论“我海他川”的言说方式[J/OL]. 中国儒学网Confucius2000, 2005.

(丘山石: 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添加: [丘山石](#) 最后编辑: [系统管理员](#)

点击数:10603 本周点击数:13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 (只显示最新5条)

没有找到相关评论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

| [设为首页](#) |

思问哲学网 Copyright (c) 2002—2005

四川大学哲学系·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

蜀ICP备05015881号